

· 中医新世纪大论战 ·

ZHONGYI XINSHIJI
DALUNZHAN

FAXIAN ZHONGYI

何裕民 著

发现中医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 中医新世纪大论战 •

发现中医

何裕民 著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现中医 / 何裕民著.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7-81072-894-2

(中医新世纪大论战)

I. 发… II. 何… III. 中国医药学-普及读物 IV. R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8004 号

· 中医新世纪大论战 ·
发现中医

作 者: 何裕民
责任编辑: 李春宇

出版发行: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东单三条九号 邮编 100730 电话 65260378)

网 址: www.pumc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丽源印刷厂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5.7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一版 200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26.00 元

ISBN 978-7-81072-894-2/R · 886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及其他质量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何裕民

生于1952年，浙江义乌人，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中医肿瘤专家，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医学辨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全国医学辨证法教育委员会副理事长，《医学与哲学》、《中医研究》、《全科医学》、《上海中医药杂志》、《医古文》、《实用护理》、《健康世界》等近十份专业刊物及多份高级科普杂志的副主编或常务编委及编委。现为国家科技部“十一·五”国家重点支撑项目“亚健康”课题组第一负责人，国家教育部“十一·五”中医基础学科系列分化教材总主编。先后出版《中医学导论》、《差异·困惑与选择》、《心身医学概论》、《中医情志病理学》、《新编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心身医学》等专业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科普文章300多篇，涉及多个领域，为多个学术领域的开创者或领航者，如心身医学、中医肿瘤学、医学文化学、比较医学、医学哲学、医学方法论、医学人才学（教育学）、营养学以及中医基础理论、体质医学、各家学说、亚健康等。

有关中医的讨论有益于 当今医学的发展

《中医新世纪大论战》丛书序

当前，有关中医的讨论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尽管对中医的性质、作用和价值有不同看法，甚至形成相互对立的观点，但这场讨论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如何评价中医，而在于促使我们思考：今天的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学？医学应该怎样发展？

我们知道，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知识体系。由于人类处于自然和社会之中，人类生命过程及疾病受自然和社会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医学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然而，现代医学过去长期的发展趋向于纯自然科学方向，临床中更多的依赖实验检验和仪器检查，对患者的心理状况和社会问题却关注不够，导致医患沟通减少，医患信任降低，诊治技术单一，治疗效果受限，医患对立增加，医患冲突严重。为此，现代医学的有识之士提出：医学应从生物医学模式转为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这种转变要求医生应了解影响患者的心理、哲学、伦理、宗教等思想因素，而能够影响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主要存在于传统文化之中。那么，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就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相对而言，中医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探索和积累，这正是中国的现代医学发展的丰富资源。

另外，中医的长期发展至今尚未步入自然科学的轨道，大量成功的临



床治疗经验依然借助古代普遍学说来解释，或用原始的类比方法来说明，对疾病个体化和动态化的考虑大于对规律的认识，医生的个体经验总结大于标准化的探索。于是，在如今现代科技高度发达和影响巨大的社会中，我们还听见用“阴阳五行学说”、“元气论”来解释疾病，还用“风寒暑湿燥火”来说明病因，还仅靠医生的手指感觉来体会脉象，还主要凭医生的个人经验来诊治疾病。这就导致不能对中医有效的临床经验进行科学解释，中医的科学成分不能被有效地提炼，中医所触及的客观规律不能被真正认识，中医的诊治方法难以标准化，而对中医的批评和质疑始终不断。其实，正像中国的现代医学发展应该学习中医的人文精神和沟通艺术一样，中医的发展也应该学习现代医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两者的结合才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过去，尽管现代医学提出了医学模式转变问题，但并没有注意到中医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尽管中医内部也有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的探索，但显然不是以科学思想和方法为本，而只是用其来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

正是目前这场有关中医的讨论，使我们更全面、更实际地思考现阶段医学的发展问题，包括中国的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发展问题，两者的不足正是对方的优势，显然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来看，传统医学最终将融入现代医学之中，但中国的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独立存在。在这个期间，中国的现代医学将逐渐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从而带来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大量地用科学方法验证中医成功的治疗经验，不断将传统医学的科学成分融入现代医学之中，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二是培养真正掌握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两套本领的人才，充分发挥中医熟悉传统文化的优势，既懂如何与患者沟通，调动患者战胜疾病的积极性，也懂得防治疾病的科学方法，从而在中国推动现代医学的模式转变，并成为这种探索的重要力量；三是完整地保留中医的传统特色，以较小的规模和传统文化的形式加以保存，从基础教育到专业教育，从教学内容到临床技艺，要完全恢复传统本色。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再也不要在思想上将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对立，

虽然两者的产生有东西方之分，但我们的目的是如何让两者更好地为我们的健康服务，何况大多数国人所说的西医就是中国的现代医学，即在中国应用和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它和中医一样，都有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我们的目标是促进中国的医学发展，对中医临床经验的科学验证将丰富现代医学的科学内容，中医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将有助于现代医学的模式转变，中医传统的完整恢复将有利于中医传统文化的继续保存。现代中国需要熟悉中国人及其文化和精通现代医学知识及技术的医生，需要呼唤中国的医学尽快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

当有关中医的讨论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甚至愤怒时，我们应理性地看到其积极作用。中医的存亡不在于外部如何评价，而在于自身如何发展。如果中医内部越来越缺乏创新和发展动力，外部无论怎样赞扬和保护都无济于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对中医提出批评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应该将外部的批评压力转为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上，发展中医曾经是近几代中医人的奋斗目标，但这种奋斗不只是一个医学发展问题，常与我们的民族情感、文化血脉和社会心理紧密相连，也强烈触动着主流中医的传统观念、知识结构和理论基础。发展就是要有所改变，任何改变都会带来新与旧的冲突，带来创新与传统的冲突，也带来少数人的理性与多数人的情感冲突。当中医界乃至中国社会不能接受或完全拒绝这种改变时，发展中医常被视为背叛中医或否定中医，那些为之奋斗的人们只能改变或放弃自己的奋斗目标。

这次有关中医的讨论是否再次创造了中医发展的契机？目前尚难以下结论，但这种广泛的思考和争论，触动了许多中医学生、教师和医生的心灵，促使他们对中医的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引发他们对中医未来进行深刻思索，激活他们推动中医发展的动力，从而促进当今医学的发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院校长助理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长

袁 钟

2007年1月

明明白白地死与稀里糊涂地活

——后现代语境中探寻医学之本质

(代前言)

近年来，关于中医学的争论又见热闹。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中医学的科学性（科学不科学？），以及中医学的存废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价值肯定与否定）。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更愿意把这场争论的焦点转移到表层现象背后更深层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论战的更深层的焦点是围绕着什么是科学？医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医学有没有自己的特点？有的话，这特点又应怎样？以及中医学理论知识的有与无，及其真理性等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通过争鸣，帮助进一步明晰这类问题，其意义不仅超越了单纯中医生存发展诸类命题，而且，对于现代整个医学的进步，也都可能有所裨益。

本书正文所辑录的文稿，是十几年前笔者对中医学有关理论问题以及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背景、现实意义、方法特点诸多有趣命题有感而发所撰写的杂文。当时还想写她的续集，重点谈谈中医学的技术与应用特点等，惜未能遂愿。十多年，弹指一挥间，旧的话题（中医学存废），又重新提起（80年代末也有过类似的思潮）。为此，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袁钟社长建议将此书稿稍作修润后再版，以期对人们理解中医有所帮助。人们常说，只有理解了“对象”，才能对“对象”展开有意义的讨论。中医存废讨论亦然。说实在的，习医30余年，笔者自身就由一个从最初的极端排斥（类似于“否定”与“告别”吧？！）到逐步理性地接受，到今天的“热爱与执着”（为此，笔者还编撰了《从排斥到热爱——我为什么热爱中医》一书）的演变过程。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逐步体验了中医，理解了中



医之后。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亲口尝尝梨子。美国著名医师刘易斯·托马斯曾不无深意地坦言：他对医生本人不患重症感到“遗憾”。因为如果那样，他就始终无法体验患者的恶劣处境，始终无法真切地感受一个人面临生命危难时的悲伤和恐惧，自然也就无法“亲同己出、感同身受地去呵护与体恤对方。”我们也是这样认定的。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敢说大话；正因为没生过病，没法体验生了病以后的无奈和对有效的医疗方法之渴盼，因此，站着指点江山不仅不腰疼，而且挺“风光”，挺“革命”，“挺潇洒的”！作为强烈反衬的是，笔者临床上遇到许多接受了中医治疗的高资历的肿瘤患者，包括多位三甲综合医院的院长，却比笔者对这股“告别中医”浊流更为深恶痛绝，斥之为“作秀”，“数典忘祖”，“不配谈科学”，因为他们自身的深刻体验，比一打最时髦、最革命、最激进的理论或口号更能说明问题。

本书正文毕竟是写于10多年前的，且并非针对此次争鸣而写的，因此，仍有些话不吐不快，故借前言，作些赘述。笔者想针对此次争鸣，谈四个问题：一是中医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二是医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三是科学（含医学）的评价尺度问题；四是强调医学应该是历史经验加科学人文精神的融合物。

一、中医科学问题——一个虚假的命题

关于科学的宽泛与狭窄界定 从上世纪初开始起，中医是不是“科学”就一直萦绕着中国学术界，这是历次争论的焦点。其实，这是一个没有解，也不会有解的命题，虚假的命题。因为它涉及了“什么是科学”这一本身有待明确的话题。换句话说，以什么作为参照来评定“科学”“不科学”。我们说，科学这个词，不是舶来词，就像宗教、哲学、天文、医学、卫生、健康一样，源自本土。宋陈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即有：“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之说。本土的科学有两层含义：一是科举之学，二是（分科的）学科知识。只不过它现在成了对英语 Science 的意译。就目前国内外科学界对科学（Science）的理解

而言，它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宽泛意义上说，等同于知识。英文辞典中 Science 下，常注明同古代的 Knowledge（即知识）；在汉英词典的科学条目下，既有 Science，又有 Knowledge；1999 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条目指：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同书的“科学理论”条目又指：“由人类的想象力构想出的广阔领域的系统性概念化结构，它包括关于物体和事件内在规律性的经验定律的体系；这些物体和事件既可以是所观察到的，也可以是假定的；由这些定律所提出的结构并设计用科学的、合理方式来解释这些事物……”。而《大美百科全书》在讨论“科学史”条目时，指出“任何科学史都必须从叙述科学的启蒙期开始。研究人员面临着许多问题：早期的人们是怎样发明和制作工具的？他们是怎么获得算术、几何与天文的基本原理的？他们是怎样发现有助于健康的食物和治疗疾病的药物的？……”很显然，从这些权威的注解中，中医学属于宽泛的科学（Science）范畴，应绝无疑义。本书正文中所阐述的大量中医学内容，正符合这类权威典籍所界说的科学或科学理论之范畴。

然而，科学又有一类较狭义、较绝对的理解。它就是上世纪 20~30 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界定。更确切地说，这种理解缘自近代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他认为观察与实验（亦即实证）是获得一切知识唯一正确、可行的途径。而这方面就典型地体现在经典物理学的研究之中。因此，物理学就成了科学的典范。物理学 = 自然科学 = 科学。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整个一套的学科范式，就成了其他学科必须遵循的规范。建立在还原论、决定论基础之上物理学方法也就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唯一可行的途径。舍此，人们便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这种思潮，又被人们称作为“唯科学主义（论）”或“科学主义”。它的出现与盛行，显然与近代从牛顿开始的物理学的巨大成就有关。如，根据美国 Herilage 辞典的定义：科学主义就是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可适用于或有理由应用于所有的探索领域。

成了教条的科学主义 由于物理学和西方科学的巨大成功，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科学主义在世界科学哲学领域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科学主义成了这么一种思潮，一种文化上的威权。用欧文（Owen）的话来说，就是



它要“把科学有限的原理转化为无所不能的教条，从而使之超越具体知识的范围的主张”。而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则批评认为“唯科学主义（即科学主义）指的不是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而是指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例如中国 20 世纪 20 ~ 30 年代科学主义的主帅（也是反中医的领袖之一）胡适先生就认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可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

我们已作过分析，“告别（中医）论”者所持的大多为科学主义的观点。他们手执科学主义的大棒，俨然如“科学”的判官，顺其者“纳入科学”范畴，忤其者或斥之为“伪科学”，或斥之为“反科学”，而不管他们自身对这些学科了解多少。例如，反伪科学的“斗士”，也是明明确确把中医阴阳五行学说斥之为“伪科学”，甚至连科学也不是。

一个范例：理性对疯癫 讨论至此，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对理性的批判很值得一提。福柯在其代表作《疯癫与文明》中，从对西方社会的疯癫史的深入研究切入，展开了他卓越而现代影响巨大的分析。他认为，“正是理性界定了疯癫，同时也是理性造就了疯癫”。通过对隐藏在理性的语言背后的因素的追问，福柯发现，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明史中，随着人类觉醒的理性开始对人自身进行分类。“凡是不符合所谓理性标准的都冠以疯癫的名义，进行处罚”。“在这里，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在紧闭的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既然亚里士多德都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其相反的命题必然是疯癫是人的兽性的自然存在，因而疯癫必须服从理性人的决定”……。写到这些，我突作联想，不是吗？把这里的“理性”，置换为“科学”，把“疯癫”置换为“中医学”，在先验的前提下，我们大胆的“告别论”者们，不也正在对“中医学”等施行着各种审判或惩罚吗？以种种堂而皇之的名义，将其“流放”出人类科学之列（踢除出医学之列）！这里，有的只是以科学名义的“淫威”与话语霸权。用福柯的话来说，这是“在理性的名义下产生的规则，以完成了对人的全面统治”。因此，福柯认为“作为科学主义的核心理性，在科学完成它的解放功能后，日益成为一种压抑力量。”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批判，

这同样也是对今天的所谓中医与科学关系的很好注脚。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关于中医学科学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是个无解的虚假命题。人们所持尺度、标准、参照系的不同，自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与判断。就像国际关系中关于“人权”问题一样。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以他自身的“人权”标准为尺度，趾高气扬地指责他国，包括中国不尊重人权，且信誓旦旦地以国际人权警察和捍卫者的身份行事。而中国等则认为生存权也是人权，且是最主要的人权，并针锋相对，以白皮书形式，揭露了美国自身到处践踏“人权”和自身国内糟糕的人权纪录。这种争斗，除去政治意义、国家利益外，是不会有真正的学术意义的，也不可能有什么公认的结果的。因此，我们呼吁：应停止关于中医科学性的无谓争议，而把焦点转移到更实在的问题，比如说怎么促进医学、或者中医学的发展上来，等等。

对科学主义教条的超越与消解 其实，20世纪中叶以后，科学主义在西方已逐渐失去了它以往的威权，它遭到了两股力量的挑战消解：一是科学领域的新科学体系，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和以混沌学为代表的复杂性科学，特别是后者，被称作为新科学体系的标志，她们对科学决定论提出了致命的挑战，因为这些学科都体现了“非决定论”。其实，生物学领域同样有鲜明的不同声音（尽管比较孱弱，但直接涉及医学，允下文分析）；二是科学哲学内部，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昌盛不久，上世纪中叶后科学哲学崛起了许多影响很大的学派或代表人物。从历史主义，到实用论者，到福柯，以及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既超越了科学主义，又从根基上和各个层面，消解了科学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对此，已有大量论著涉及，在此不作赘述。

我们并不认为科学主义一无所是，在许多领域内，源自经典物理学的学科范式，特别是研究方法，还是有其突出意义的。不然无法解释上几个世纪西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无法理解这种观念何以在海内外盛行多年。然而“真理向前一步，便是谬误”。“把科学有限的原理转化为无所不能的教条”，就使得它从原先的科学的解放力量，不仅异化成为科学探索和发展的压抑力量（后现代主义对其的批判），且十足地体现了“唯西方



中心论”；同时它也凸现出自然科学的唯一中心地位，从而排斥了诸如哲学、社会学、人文科学、艺术等的应有地位。后现代主义者们已对这些作了多层面、多个核心思想的消解与批判，后现代主义大多强调科学多元论、文化多元论、方法多元论。因此，我们觉得现在更应该在后现代语境中思考中医学的科学问题及医学的发展问题。

很显然，由于参照标准，或曰评价尺度的不一，对中医学是否“科学”问题，自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根据一般的对科学的理解，那当然可以把中医学列入科学范畴，可以说她是诞生于中国的关于健康与生命的科学知识，只不过由于时间上、地域上的关系，她属于传统的科学。与近现代诞生于西方的相关知识，有着自身不同的范式——从观念到方法，到具体认识，到理论表达。这种差异既是难以避免的，也凸显了她的现实意义。正因为有差异，才有可能互补，才有可能可以相得益彰。当然，差异中还包含着许多谬误、许多非理性的成分，这也很正常。恩格斯就曾很明确地指出：“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荒谬思想逐渐被排除的历史，是它被新的、荒诞性日愈减少着的荒谬思想所代替的历史”。不是吗？近30~50年来，西方医学史，不少医学理论的演变，也不正经历着这一过程吗？

我们认为，中医学是科学或者说传统科学，并不意味着中医学很完美，中医学超越了现代科学，恰恰相反，我们强调中医学是一门从巫术丛林中走出的，行进了几千年，带有她相当合乎理性的知识和有用的技术，同时又夹杂着许多荒谬不伦等内容的学科体系。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否定她，这很容易，很干脆，却犹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泼脏水把孩子一起泼掉一样，缺乏起码的历史主义、辩证主义观点，也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当今应该强调的是对中医学的批判与创新，继承与发扬，就理论部分内容而言，我们主张应解构与重建。

二、医学与物理科学的关系问题

——一个远未澄清的问题

在告别论者眼里，中医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必须扫地

出门。而西方医学，或更准确地说，现代生物医学，则是的确确的科学，她是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唯一的一个分支，天底下的医学也只有她可能称之为科学，其余均属杂七杂八之类。很显然，就他们看来，生物医学是自然科学（物理科学）的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物理科学的方法，可以在生物医学领域通行无阻。循着物理科学所塑造的科学方法体系，生物医学就能达到她理想的“彼岸”。果真如此吗？医学真的就是科学主义所论定的“科学”类型或分支之一吗？这一问题，对医学或生物学并无过多涉猎者（就像我们几位“告别论”者那样）自会草率地得出肯定的答案。但事实上，两者的关系绝非这么简单。若要作一番深究的话，医学，包括现代生物医学还不是（或曰还够不上）物理科学分支（的水平）。也许，她永远成不了物理科学的一个标准分支。因为研究生命这一复杂现象，解决生老病死这一类非线性难题的医学，决不可能仅仅通过简单照搬、移植从处理无生命的物理世界而发展起来的物理科学的方法、原则所能解决，尽管她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借助物理科学的成功和成熟的方法原则，但她毕竟更需要有自己的一整套方法原则，一个更为恰当的学科范式。

（一）医学不完全是科学

须指出：医学不完全是科学，或者说她的主体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此话并非本人所言，而是杰出的科学哲学家、历史主义学派代表科恩所言。科恩在其名声如日中天的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对美国医学会的讲演所言。这是科学哲学界的著名论断。

首先，临床诊疗尚够不上科学 科恩的依据为：医学的主体为临床诊疗，生物学等作为基础学科，只是医学所傍依的，借用的，并非医学所独有。临床诊疗是门经验，完全够不上“科学”的标准。作为医生，我听了以后，也感到非常不悦。但却没法否定。不是吗？临床医疗主要依赖经验，不仅看中医人们要找老大夫；西医内科人们同样要找 50 岁以上的主任医师，为什么？经验丰富呗！而一般的物理科学，最富创造性的年龄段是 30 岁上下，50 岁是告别前沿的年龄了。作为佐证，当今大兴特兴的“循



证医学”，明显地具有反科学主义的倾向。循证医学现已成为临床诊疗研究的新原则。它强调“回归临床”；主张以患者为中心，而不是以生物学的疾病为中心；以可信的临床证据为依据，而不是盲从实验室的指标或实验结果；力求对临床多种信息作出采集，分析、评估；强调整体综合考虑；强调医患良性交往互动……，一句话，对过去的科学主义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反叛，更注重临床证据与经验。

医学：一个包括人文精神等庞杂的知识技艺体系 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医学（无论中西医学），绝对不只是一门狭窄的科学技术体系，它的涉及面甚广。早在19世纪中叶，细胞病理学奠基者魏尔啸就曾有过一著名论断：医学也是门社会科学。而很有影响的医学史专家西格里斯在其《医学史》专著（1959年）曾这样说：“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令听众们感到震惊”。追溯到更早，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睿智地指出：医学（疗）的艺术乃是一切艺术之中最为卓越的艺术！王一方先生则以“医学：科学的，更是人文的”为第一讲题，展开了他的医学人文学十五讲。笔者在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中医学导论》中则明确地指出：医学是多学科交互的产物，她不仅仅是门科学，是种技术，也具有社会科学属性，与哲学关系尤其密切，且有技艺、艺术与仁术的成分，它的目的是祛除病痛，添增快乐，医学还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饮食起居皆关乎康疾寿夭”。医疗还是种社会建制。Lynn Payer在《医学与文化：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的不同医疗方法》（*Medicine & Culture: Varieties of Trea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West Germany and France.*）中比较了这四个国家的医学现象，发现差异极大。例如，在这四个国家中，医生开处方的药量会有10至20倍的差别；美国的人均外科手术率是英国的2倍，乳房切除术的比例是英国的3倍，冠状动脉手术率是英国的6倍；美国的高血压到了英国则是正常的，而在德国就算病状；……谁都知道，这四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了。作者认为：医疗中的这种巨大差异，就是由于文化造成的。

总之，所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指明了医学的综合性质，医学的复杂

性。若仅执物理科学之一端，以“科学”为尺度作为评判标准，前提就是站不住脚的。结论更是无意义的。

（二）生物学必须与物理学保持持续的隔离——生命科学哲学的不同声音

众所周知，医学的科学基础，主要建立在解剖、生理、生化等生物科学分支的基础之上的。近代正是这类科学的进步，促进了生物医学的蓬勃发展，而这类学科大多借助了经典物理学的还原论和观察、实验等实证方法。因此，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原本存在的密切关系使人们自然联想起生物医学也就是物理科学范式在医学领域的成功运用而已，因此，生物医学属于物理科学的分支，果真如此吗？我们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

“分支论”与“自主论” 对于生物学与物理科学的关系，现在形成了“分支论”与“自主论”两派。分支论认为：生命现象本质上就是物理化学现象，因此生物学与物理科学并无质的不同。生物学当然是物理科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趋势，整个生物学最终将还原为物理科学。这一观点目前占居主流地位。它驱策着生物医学的发展与深化，以致于生物医学模式成为主导性模式，已成为医学领域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它已获得教条的地位”（恩格尔语）。

在分支论者看来，因为生命最终是由物理材料——运动中的分子和原子组成的。这些分子和原子在生物体内被集合在不同的组织水平，尽管目前尚不能用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来解释生命过程中一些层次的物理运动，但“最终人们希望生物学的整体可根据比它低的水平，进而正好从原子水平得到解释”。（克里克语）鲁斯更认为：“不管怎样，我们将会看到生物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终有一天会消失的”。

自主论却认为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概念结构与方法论体系等都与物理科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生物学理所当然地是一门自主的科学。

生物学的许多研究结果揭示：生物学目前还不能像物理科学那样有许多简单明了、精准确切，相互联结且具有解释和预测能力的定理或规律，它的许多发现和描述语言与物理学和化学的发现和语言很少联系，它研究



的模型系统的普遍性也是有限的。特别是20世纪生物学科领域，除分子生物学外，群体遗传学、综合进化论、生态学、行为学、分类学等学科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些学科各自有着自身的词汇、方法论和概念结构，他们与物理科学联系不多。从事这些学科的学者及从这些学科中搜集材料的生命科学哲学家就常对分支论持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尽管物理与化学方法在生物科学研究中曾取得过重大成就，但是物理学和化学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生物学的主要研究。“生物学真正重要的目标以及获得这些目标的适当方法，与其他科学的目标和方法是如此不同，以致于生物学的理论和实践必须与物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保持持续的隔离”（罗森伯格）。

波普尔也曾明确地指出：“生物体的问题不是物理学的；它们既不是物理学的事情，又不是物理学定义所能描述的；也不是物理学的事实。它们是独特的生物学存在，它们的存在可以是生物学结果的原因。”

自主论者强调：生命不同于一般的物理运动，有其鲜明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生物学追寻的是生命过程中用物理学无法回答的问题，需要而且必须运用物理学所提供不了的方法与手段。至于目前的物理科学的种种研究手段与方法，生物学（包括生命科学和医学）可以最大限度地借用，但它必须形成自己的方法。他们认为：后实证主义从物理学中得出的科学图景对生物学来说是不适用的，甚或可以说完全错误的，它有可能导致生物学研究走向迷途，阻碍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生命科学理应成为一门自主的科学。

自主论者对分支论的挑战，可以说是在生命科学哲学的所有领域进行的。其中，主要的涉及以下一些重大的生物学问题：

基本框架 自主论者认为，物理科学的解释框架是因果论的或机械论的，而生物学的解释框架则是功能论的或目的论的，后者无法还原为前者。就自主论看来，生物学探讨的很多现象是功能学意义上的，它有着某种明确的合目的性，进化论揭示的生物长期的演化过程是这样的；解剖学发现的生物体解剖构造是这样（如奥狄括约肌只允许胆汁单向地流向肠道，却不允许反向，而这合乎了消化功能的众多合目的性）；生物研究中明确了的各种生理调节环节和过程也是这样的。而这些，在一般物理世界